



## 资深教师

### 陈振尧老师访谈

#### 受访者

1950年12月，响应抗美援朝号召，在上海参军，到南京三野政治部报到，后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法语。1955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，先后担任法语系第一教研室主任、各年级及研究生组教学组长、系务委员、系主任、《法语学习》杂志主编、校务委员、校学术委员会委员。曾连续两届任国家教委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，法语组副组长；三届北京市高教局高校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，副组长、组长。1986年至1997年，任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第二届、第三届理事会会长。1989年至1992年，任国际法语教师联合会（FIPF）亚太分会主席。1992年至1996年，任国际法语教师联合会常务理事。1992年获法国棕榈叶学术勋章。

#### 采访者

史兆一、尹轲文

1950年您在上海的军事干部学校学习，1951年又来到北外学习法语。请问您最初为何选择军干校，后来的转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？

这个情况有些出入。1950年秋天，我在上海震旦大学附属高中读高三。震旦大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，它当时是上海唯一一所使用法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大学。我当时在附属高中读书，是希望今后可以进入震旦大学学习的。20世纪50年代朝鲜战争爆发，我响应中央关于有志青年进入军事干部学校的号召，决定参军。参军后，我的第一志愿是海军，但最后被组织分配到外语专业。1950年12月9日，我们离开上海前往南京，在第三野战军政治部的外文训练班学习外语，不久后又被北京派来的同志接走，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，即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。我由于先前在震旦大学附中学过法语，便被分配到北外法语组。也就是说那时不是我自己选择了法语，而是法语选择了我。说实话，那时我也不是非常愿意学习法语，觉得法语太复杂，是一件令人劳累的事情。如果那时我能够继续留在震旦，我可能进入法学院、工学院或医学院学习，成为律师、工程师或医生。在北外本科毕业，后来读研究生，留在学校深造。

您能回忆一下当时的学习生活吗？

我们当时的老师，主要是一些曾在法国留过学的同志。比如当时有一位宋先生，是震旦大学法学院毕业的，后去了法国读书，和周恩来总理住楼上楼下，平常给在法华人打官司、帮留学生改论文。他的法语水平非常高，回国后在南京的中央大学教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被聘请到北京外国语学校。第二位郭先生，从小便在法国生活、学习，所以他的法语是要比汉语还好的。最后一位谢先生，厉害到自行车的每个零部件都能用法语说出来，法语水平真的特别高。所以说，我们当时的教师，法语水平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，教材和工具书则非常缺乏。当时用的是莫斯科师范学院和外贸学院的法语教材，辅助读物有莫斯科晚报的法语版等，能参考的东西极少，多半是靠看老师发的讲义，学习条件比如今艰苦得多。后来，我们引进了法国共产党的一些材料，才算是看到了地道的法语。虽然在这方面条件比较差，但是当时的师资力量确实很强，而且学习的环境好，楼下是宿舍，楼上就是教室。

**您的学术经历和研究方向都十分丰富，在语言学、文学、翻译、教学法等方面都发表过论文，请问您是如何做到在专业领域上如此全面地发展的？**

我从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写文章、搞研究了，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在学校教务处发表的，讲的是法语学习方法：将外语原文译成中文，再将中文译回外语，然后将自己的译文与外语原文加以对比。这个方法是列宁发明的，我用它学习法语效果显著，就推广给大家，冠名“回译法”。我的第二篇文章是文学方向的，主题是关于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。20世纪60年代为响应“向科学进军”的号召，中央组建了大学文科教材编写班子，北外负责法语一年级1、2册和二年级3、4册两套教材的编写工作，我本人负责后面两册，这是我编写教材的开始。改革开放以后，我首先出版了《法语口语》，是“文革”以后第一本外语专业书。接着，我又出了《科技法语教科书》和《法语语法》。然后，我想到当时的法语教学和研究领域存在较多的空白，还需要填补词汇、教学法这些内容，便写了有关书籍。除了填补这些空白，我当时还担任《法语学习》的主编。杂志每两个月出版，但是有的时候文稿数量或者质量达不到要求，需要主编来填补。我记得有一期8万字的小册子，我自己写了4万字。此外，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多报纸杂志：《人民戏剧》《中国语文》《地理知识》《解放军报》《光明日报》等，我向这些报刊都投过稿，一共发表了100篇文章。

虽然我涉猎较广，但还是有一些遗憾，我有两本书没写：一本是关于中文语法的。有人会问：为什么？你不是搞外语的吗？我认为搞外语的人对汉语语言结构有更深刻的理解。中国自古以来，只有一本中文语法书《文心雕龙》，是刘勰写的，之后这方面的著作就不多了。中文到现在为止没有一部权威、专业的语法书，这是很滑稽的事，却没有任何人提出这个问题。当然也有人写过相关的内容，但是不够成熟。法语语法是比较成熟的，搞法语的人有能力、有义务把中文的语法体系树立起来，打好基础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另一本是《逻辑学分析》。我们应该重视逻辑学的教学，只有逻辑条理清晰的人才能够把问题分析得清清楚楚。我想写的这本书，可以叫《逻辑学入门》或是《逻辑学基础》，但可惜我现在没有精力了。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比我们当时好得多了，希望你们这一代能够出人才，把剩余的空白填补起来。

**您刚刚提到了教材的编写，您的《法语语法》和《法国文学史》到目前为止都是非常热门、经典的教材，请问您在编写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难题呢？**

编写教材是为了填补某些学科教材的空白，所以首先出了《法语语法讲座》，这是供研究生阶段学生使用的讲义，内容较为专业、深奥。然后我又出了一本普适性、通俗性较强的语法书。当时法国文学史学科的教材也是一片空白，社科院出过一本法国文学史，但是只有上部，没有下部，我觉得这样不行，决定自己写一本。当时我们是好几个人共同写，但是文学史的规模较大，有几个人觉得累不愿意写。我没有办法，虽然文学不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，但还是决定一个人写下来。然而我对《法国文学史》还是有一些遗憾：一方面，当时外研社要求我写30万字最多35万字，我不得不删减了不少内容；另一方面，文学史作为历史，需要一个沉淀过程、一段等待的时间，有些内容、作品，不能刚一发表就编入教材，所以我写到20世纪60年代就停止了。后来用了10年的时间，和同事们呕心沥血编写词典，牵扯了太多的精力，如今想继续把文学史补全，也有些力不从心了。

**自1986年起，您开始担任系主任一职，请问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您工作的重心吗？在您任职期间，我们法语系又有哪些大事发生呢？**

我担任系主任的时候，同时还被选为中国法语教学研究会会长。因此，我既要管理法语系的教学，也要关注全国法语教学的情况，工作还是较为繁重的。我作为系主任，主要有以下几项工作：第一，教材建设。法语教学不能没有合适的教材和工具书，而这些书的编写与其他书有所不同。我们经过科学统计，得出十七八岁的青年每个星期能够消化的生词在80至85个，能够吸收的语法规则在两条左右这一结论，而这对教材的编写也是一种限制和约束，增加了工作的难度。第二，师资队伍建设。外语学院对师资的要求非常高，一方面要求教师的基本功非常好，即听、说、读、写、译5项技能都要扎实，这是有难度的；另一方面要求教师具有科研能力和综合组织能力，这也是很难的。第三，对外交流建设。在10年内我们建立了一个加拿大研究中心和一个瑞士研究中心，这两个中心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立的。当时我国经济较为落后，我们与外方的谈判是不完全对等的。但是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是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，其中我认为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在1989年4月，我担任世界法语教师联合会常务理事期

间召开的亚太分会。这是当年召开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来自日本、韩国、老挝、印度、印尼、越南、柬埔寨、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。这次会议影响深远，从此奠定了我国大学法语专业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。我们法语专业，能够召开如此大规模的国际会议，而且为了筹办这次会议，我们没有向任何国家申请经济支持，在经济上完全自负盈亏，这是意义重大的。

**北外是一所拥有红色基因的学校，请问您在20世纪50年代求学的过程中，在这一点上有什么体会呢？**

红色基因这个词是比较新的，过去我们叫革命传统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我觉得当年求学的时候，有很多课程，对我有很多好处。一个是我们当时政治教育抓得很紧，先后学过胡乔木的《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》，还有艾思奇的《社会发展史》，还有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史，还有哲学，甚至经济学。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政治经济学，我对这门学科非常感兴趣，不光是理论层面，还有其中的思维方式、思考方法，对我之后搞学术研究有很大帮助：知道怎么分析问题，怎么推理，怎么综合，这让我的能力提高很快。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注意学习，多学习政治理论，不论是对你的思想的形成，还是对你学术研究能力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好处。过去我们虽然是研究生，但是并不做论文，我从来没学过怎么做论文，可是我后来要做学术研究，还要指导研究生。从选题到收集资料，到最终写作，整个过程全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问给我的锻炼，给我的思考。

**您教书的经历十分丰富，在全国外语教学界担任过很重要的职位，也在世界法语教师联合会工作过，您认为北外的法语教学有什么特点呢？**

北外法语教学的特点，一个是历史传承，另一个是科学创新。纵观中国法语教学，我们有了很长时间的积淀，底蕴深厚。但事实上，中国大陆的法语教学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基本上跟日本、中国台湾等地都是一样，手把手地教，没有科学性。那么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学方式比很多国家、地区完全是高出一等。我认为，这个跟我们学习苏联有很大的关系：我们在跟苏联关系密切的时候，外语学院聘用过3位苏联专家，其中有一个是法语专家，她是研究语音的，她也让我们真正知道了什么叫语音科学。在这以后，我们的语音体系建立起

来了，也学习到了国际音标，这在我们当时是不存在的。此外，我们还建立了一个词汇体系，哪些词是复用词，哪些词是常用词，哪些词是基本词，它给你分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完整的外语教学体系都明确下来，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，老师们一下就开窍了。另外，我们还学习了很多教育学理论，比如说凯洛夫的《教育学》，明白了学生的心理状态、接受能力都是有教育科学的依据的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。现在中国台湾也好、日本也好，在这方面做得都不如我们好。我们当时也去过台湾，我发现我们编写的字典、文学史、语法书都在台湾出版过，很多教材都是从大陆引进去的。所以我们北京外国语大学现在的法语教学水平不仅在全国是领先的，而且在亚太地区也都是领先的。

但是这些都和当时从苏联引进来的东西分不开。从世界角度来讲，苏联和东欧，他们的语言科学水平绝对是遥遥领先的，我们应该继续向他们学习。但有些遗憾的是，当年真正领会到他们的经验的人也不多了。现在 we 和法国、加拿大关系比较密切，但是他们的语言科学水平远远不如东欧。